

清末民初研究论稿

■ 李书源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清末民初研究
論稿

清末民初研究论稿

李书源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研究论稿/李书源著.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1.7

ISBN 7 - 5383 - 2360 - 0

I. 清… II. 李…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134 号

责任编辑:王世斌

封面设计:尹怀远

出 版: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市同志街 55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 数:365 千字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2.50 元

ISBN 7 - 5383 - 2360 - 0/G·2152

序

五一前夕，书源把他的论文集清样送来，邀我作序。作为师兄，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并和他一起斟酌，建议他把书名定为“清末民初研究论稿”。他愉快地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样，我便有幸在五一假日里通读了书稿，成了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书稿中的文章以前发表时，我大都读过，但今天集中起来重读。仍感到受启发，有所得，也引起我不少的联想与感慨。

书源属于初中“老三届”那一代人。十年文革开始时，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然后就上山下乡。他干过农活，也作过乡村小学和中学的教师。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段知识等于愚蠢、文化就是罪恶的荒唐岁月中，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学习，自学了高中的课程。当时他并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因为无论是推荐还是保送上大学，都根本与他无缘。他仅是对知识有一种强烈的渴求。只是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无心插下的柳枝才勃发新绿，他于1978年以本市文科第一、辽宁省文科前50名的好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他入学后学习特别刻苦。当时任教的老师大都教学严谨、颇具声望，特别是李时岳先生主讲的中国近代史，更具吸引力，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书源从事近代史研究的想法大概萌生于此。

在本科学习期间，书源就显示出了较强的研究能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书稿中的《太平天国“租息局”考略》一文原是他大学二年级中国近代史课开卷考试时的习作，李时岳先生阅后，评语为“细致扎实，文亦如之”，建议他继续充实修改。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几次修改后，他把文稿投给了《近代史研究》杂志，结果一发即中。研究生学习期间，书源重点研究了近代外交问题。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即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对外政策”，约10万字。书中一组鸦片战争的文章，基本上是其硕士论文的结晶或拓展。

我是1979年秋考取李时岳先生的研究生的，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又是与七八级本科生一起听的，所以很自然地与书源及几个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感兴趣的同学相识，并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1982年，他和雷颐、李晶、翟厚良四个人一同考取了李先生的研究生，而我则毕业留校任教。我们师出同门，彼此的交往与交流自然又进了一步。特别是书源毕业后也留校任教，我们更是经常在一起切磋，彼此的研究方向、重点都很了解，还在某些课题上进行过合作，所以，对书源论著的写作过程，我是了然于胸的。

纵观书稿中收录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选题寓新奇于平淡之中。书源为人质朴，文亦如其人。他的选题从不好高骛远、哗众取宠，更不肯赶时尚，炒热点，而是在不同时期，围绕一个研究方向，把学术领域的薄弱点与自己的兴奋点结合起来，从基本史实的厘清和基本资料的搜集入手，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功夫到了，思想的火花自然迸发出来，于是便能捕捉到前人未能捕捉到的东西，从而取得新的突破，产生新的见解。如书中关于民初政治与政党的一组文章就是如此。民初政局很长时间内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

点。李时岳先生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的一次谈话中曾建议我以民国初年为研究方向。他认为这是个亟待开辟的新领域。对此，我虽做了一些努力，但浅尝辄止，仅从思想史的角度有所涉猎。倒是书源在这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先生的遗愿。他不仅写成了一部颇有新意的黎元洪传，而且发表了有关民初的系列论文。这些文章从基本资料入手，对民初的政局、政派、政党、国会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既有微观上对一党一派、一史一事的廓清，也有宏观上对民初政局、资产阶级政党地位作用的阐述。题不惊人，语不耸众，读来却使人耳目一新。

二是寓质疑于多方求证之中。相对而言，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学科中研究形态较完备、起点较高的领域，也是体系高度主流化的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开新纠谬，需要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视角，更需要实证的科学精神。立论要多方求证，慎之又慎。在这方面，书源的文字也颇可称道。他的硕士论文完稿时，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除了朱金甫先生提出清政府是否存在弛禁派、茅海建先生从军事史的角度对失败原因提出新见外，其他方面基本上仍维持传统的叙述框架。但书源在他的论文中就对禁烟方针如何产生、钦定禁烟条例如何评价、林则徐禁烟措施是否有失误、道光皇帝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对传统说法质疑，阐述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这种质疑与新见，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资料缜密考订、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些观点后来形成一组文章。他对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性质的辨析，对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的阐述，对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见解，对黎元洪的评价，都是如此。这种在谨慎求证中的质疑，不但纠正了以往成说中的谬误，同时也发现了真理，取得了学术上的创新，所

以这些文章，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三是寓深厚积累于广阔的视野之中。这部文集，历史的时间跨度是从清末到民初，内容则从政治、经济、外交到思想文化、科技，有具象的考释辨析，也有宏观的综论概括。可以说研究的视野十分开阔。引用的资料有中文，也有外文。书源曾出国进修一年，对英文、法文都有一定的造诣，所以不仅运用外文资料得心应手，同时对国际同行的研究也有较清楚的了解，这样自然扩大了视野，加深了积累。否则，是很难做到在清末民初多个领域中都能有所发现的。

以上看法，或许有溢美之嫌，但私见确实如此。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书中的有些文字写得较早，略显幼稚，一些结论也可再行斟酌和推敲。文字上，个别文章还可进一步精练，希望书源能正视这些不足，精益求精。

1997年，书源离开大学讲坛，到出版部门工作。我个人以为这对学校、对他个人都是个损失。好在他并未与学术界疏远，仍在吉林大学兼课，指导研究生，同时也笔耕不辍。书中有些文章就是在编辑工作之余撰写的，专业的水准并未因工作领域的变化而降低。我比较赞同编辑学者化一些，尽管这可能与当前市场经济的要求有某种不合拍的地方。因为图书不是一般商品，而是文化商品，出版者、编辑不但要考虑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让图书成为文化积累的砖石，而非精神垃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书源继续保持学者的本色，把学者的人文关怀带入图书之中，继续学术上的求索耕耘，能有更好的论著问世。

宝成关

2001年5月4日于长春同志胡同寓所

目 录

序	宝成关 1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1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与新时期近代史研究	23
近代中外关系论纲	43
评西方学者的鸦片战争“文化冲突论”	76
“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的产生	87
关于《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评价问题	91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95
清政府的对英政策与琦善的广州外交	111
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的“具结”斗争	126
道光皇帝与鸦片战争	140
论洪秀全皇权主义思想的发展	160
太平天国“租息局”考略	174
关于“着佃交粮”制性质的几个问题	192
得人才者得天下——太平天国的一个历史教训	208
“中体西用”评议	220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人才实践的比较研究	232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244
戊戌后二十世纪初改良派报刊宣传简论	261
载沣与宣统政局	285
关于黎元洪评价问题	304
民初政党纷起的原因及其病态发展	317
民初民主党述略	326
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	341
“同盟会中心内阁”论略	353
“超然内阁”风波与民初党争	364
民初政党史辨误二则	378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组织的分化	383
二次革命后的国会与党争	389
政学系始末	402
研究系述略	414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与民主革命	429
文化热与近代文化史研究	446
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	456
漫话辜鸿铭	470
后 记	477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主革命时期的求索与论争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首先是作为近代革命的理论依据问题提出来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后的 80 年中，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但这些斗争，或遭帝国主义绞杀，或为封建阶级镇压，更多的是被二者的反动联盟所扑灭。在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这种血与火的交织中，人们逐渐加深着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加深着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关于“洋人助妖”是最大祸患的教训总结，维新派变法自强、救亡图存的呼号呐喊，义和团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旗帜变换，革命派打倒“洋人的朝廷”的革命宣传，都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不同阶段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反映。

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直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人们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级。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并给予科学的概括、表述，则是五四运动之后。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研究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已有人提出，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又是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是“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命运的传统政策。”^① 这些论述虽然还较为笼统，但已初步触及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革命斗争的新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正确的纲领，需要阐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性质、斗争对象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初步解决了这些问题。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这80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封建制度的把持之下。”因此，“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而“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7—538、541—542页。

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① 尽管在表述上还不够完善，但这一纲领实际上已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但是，对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在党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分歧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展成为一场论战。这次论战虽然以研讨社会性质为焦点，但讨论社会性质必然要涉及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1927 年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追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团的现实，再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未解决，因此，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陈独秀、严灵峰、任曙等却极力发挥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不复存在，“经过商业资本长期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深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 “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性质。”^③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④ 政治上，资产阶级“对各阶级取得了

① 魏宏运等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2、388、392、389 页。

②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8 页。

③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高军前引书，第 455 页。

④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高军前引书，第 488 页。

优势地位”，^①“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②对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歪曲，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前进”^③，“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仅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④，因而，“决定了中国境内整个资本主义压榨工人阶级的关系。”^⑤就是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显然，托派提出的观点涉及到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重大问题，必须予以澄清，作出回答。

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实质，驳斥了托派的观点。他们指出，近代以来，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它的商品市场，与它的投资场所，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能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性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⑥因而，“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经济”，^⑦中国经济不过是其附庸。在农村，依然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中国经济实在

①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见高军前引书，第79页。

②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9页。

③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见高军前引书，第376页。

④ 陈独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见高军前引书，第90页。

⑤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高军前引书，第469页。

⑥ 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的研究》，《读书杂志》第1卷，4、5合期。

⑦ 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读书杂志》第3卷，3、4合期。

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①既然中国近代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没有改变。托派歪曲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取消革命。但在实际上，“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解除。……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日益加紧。”“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地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剥削，……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②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盾的存在与激化，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必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统治，完成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对内则要铲除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的封建势力，打破封建生产关系底残余制度。”^③

这次论战既是一次尖锐的现实政治斗争，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近代历史与社会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究。当然在论战中，革命营垒方面的分析论述还不够完善，某些观点，如把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完全置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方还值得研究，但是这次论战驳斥了托派对社会性质的歪曲，对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动力与对象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与宣传，意义是重大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国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及社会主要矛盾都有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发展、社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见高军前引书，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见高军前引书，第9页。

③ 苏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经济》第1卷第6期。

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规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不同阶层、集团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出更深刻的分析，以动员一切力量抗日救国，争取抗战胜利。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产生了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科学、完整的理论阐述。这其中，毛泽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基本特征，研究了近代各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呈现出不同的矛盾形式，当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突出，成为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帝国主义采取较温和的形式侵略中国时，封建地主阶级则向帝国主义投降，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情况下人民大众往往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反抗二者的同盟，这时，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显得特别尖锐；当国内的革命战争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存在形成根本威胁时，则两个主要矛盾重合为一，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为一方，人民大众为一方。成为一个主要矛盾。^①但是，就整个近代史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而且，“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主要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4页、296页。

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毛泽东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他近代历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与社会实际结合的典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近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线索。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初期史学工作者的争论与徘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的科学性。因而，这一分析和表述得到了近代史学界的赞同，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对主要矛盾的不同方面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表现与表述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分歧首先在 50 年代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

1954 年，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应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准，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594 页、298 页、595 页。

命高潮为标志。^① 孙守任撰文表示不赞同胡绳的意见，他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他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它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②

讨论展开后，又有范文澜、戴逸、黄一良等一批史学工作者撰文提出自己对分期的意见。较多的是反对孙守任的主张，支持胡绳的观点。黄一良指出，把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视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认为其起决定作用，是一种“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应当是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并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它到处遇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变换，往往取决于中国人民的斗争。”^③ 戴逸认为，中国近代不存在孙守任认为的那种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变化而引起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所有的只是“矛盾的激化、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和矛盾的重新发生。”他指出，“纵然在中国形成半殖民地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是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外国侵略势力性质变化这样的外部条件要是对中国社会有所影响，必须通过中国社会自己的规律性、亦即通过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中

①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②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③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